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RUC Perspectives

思想评论

朱云汉：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

杨光斌：重返“中心”的中国及其社会科学

2016年 第3期(总第6期)

【阅读提示】本期选登朱云汉教授的主题演讲《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以及杨光斌教授的演讲评论《重返“中心”的中国及其社会科学》两篇文章。

朱云汉教授在演讲中强调，人类社会当前正处于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使得“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两个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支柱都面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这个历史坐标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巨变时代中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已经难以有效预见并解读一系列新的历史变革，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困境。此外，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也很难涵盖并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面临的困境有两大根源：一是意识形态窠臼，尤其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导致其对现存世界秩序持保守取向，缺乏批判能力；二是方法论上严重依赖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验层次，工具主义色彩浓厚，其适用前提是结构、制度和程序的相对稳定，很难解释巨变时期行动者、机制与结构间的性质与因果关系。事实上，上述论断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被科学哲学研究全盘推翻，但至今仍被西方社会科学尊为最高法则。**总之，巨变时代仍然深居象牙塔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危机重重，中国社会科学欲实现突破与超越，不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而且还要更多地与不同文化体系展开全面的交流与对话。**

杨光斌教授在演讲评论中指出，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经验的一般化理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科学的“变”已成为常态。目前各个国家的治理都面临重重危机，看的是谁能扛住并度过危机。**面对世界性危机，西方社会科学提供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百慕大金三角”。**这些说到底都属于“冷战学”范畴，或者说是一套旧式的“革命理论”。与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民主理论的革命性一样，这套理论可以用来打败敌人，但却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生活在转型国家无疑是巨大的福利，因为可以亲身体验变化中的社会，这也是理论研究的宝贵资源。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清到民国的三十年是“西学 1.0 版本”，呈现出多元主义特征，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最后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在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科学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基本处于发展的空白状态；从 1980 年到 2010 年的三十年是“西学 2.0 版本”，比之前的 1.0 版本更纯粹，是单一“主义”即自由主义的突飞猛进。**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将处于“新转型世代”，有可能形成自主性的社会科学，但必须三管齐下，即国家进场、基金会配合和学术共同体主导，而当下最为缺乏的就是有使命感的学术共同体的参与。**

主题演讲：

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出路

朱云汉^①

引子：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任危机

2011年11月1日，哈佛大学校园发生了一起被广泛报导且引发巨大风潮的轰动性事件。在前共和党政府顾问、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开设的能容纳700人左右的经济学导论课上，有70位学生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在课堂上宣读抗议书以表达对该课程的不满。他们表示，不希望教授把自己的信仰当作意识形态传授给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作为典型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曼昆过度批判了凯恩斯及其学说，更别说其他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和思潮了。此外，曼昆的课程内容虽然精彩，但在选材上也已经显得过于单调甚至乏味了。

在后来的学生运动中，也有人认为经济学过于单一和正统，主流经济学高度集中于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流派，完全不能容纳多元的学术或者思想。此外，它忽视了经济史、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思想，使得经济学原本非常丰富而厚实传统只剩下模型与计量分析。当前欧洲和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甚至中国大陆都有类似的情形，那就是正统经济

^① 作者信息：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整理自朱云汉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讲演稿。

学的教科书和课程设计非常狭隘，而且对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知识有一些规格性的要求，其实那些要求不仅会让经济学研究变得狭隘，而且对当前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均缺乏解释力。因此，真实的世界应该被带回到教程中，并且应围绕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争论。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金融稳定、食品安全等议题，正统或者主流经济学并未真正去面对，争论和探讨仍将长期持续下去。

在政治学领域，近些年有一门知识含量很高的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在对其学科内部三十年学术道路的回顾与反思中，学者们发现，他们其实在走一条经济学的或者至少以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建构标杆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他们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同样非常狭隘。最为突出的就是他们不敢或者完全忽视了真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即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或是更长历史时期内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另一位来自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学者本杰明·赛尔温(Benjamin Selwyn)更为特别，他认为有一个最突出的重大议题至今还没有人涉及，即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劳工阶层，它存在于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规模达到30亿人，而且数量还在剧增。这30亿人大多都生活在社会边缘，挣扎过日子，其中还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联合国贫困标准为一天不足两美金)。这种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它与全球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性？这类问题不仅是二十一世纪需要去面对和回答的，而且还要思考如何去改变它。以上这些都是西方特别是欧美社会内部对其主流社会科学的反思。

一、反思巨变时代中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

在巨变时代中反思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并非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能做到，一些具有多元性的学者会被挤压到比较边缘的学校，很难在哈佛、斯坦福等处立足。同样在各种学会中，社会科学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还被当作普适性的原则来推销，或者将其作为研究的前提。另外，它的方法论基础也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因为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者科学哲学的基础基本上沿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设的逻辑思维论作为方法论的指引，完全忽视了科学哲学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的深刻变化。所以主流社会科学对于什么是科学知识的本质，如何建构有效的知识等这些重要问题的认知，与最新的理论成果之间是完全脱节的。但主流社会科学为何能够存在如此之久？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

回到“巨变时代”，需要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环节也是主流社会科学遭致诸多诟病的原因，它对人类社会包括欧洲、美国自己面对的社会重大议题，似乎都丧失了帮助大家合理解释或者找到有效出路的知识引导。

（一）何谓“巨变时代”

“巨变时代”是指我们所处的社会或时代处在剧烈变动之中，历史脚步的前进速度是超乎想象的，也是多面向的以至基本上不存在“理所当然”或者可以被视为牢固而永恒的次序结构。对于中国而言，

清末民初的中国当局在困境中匍匐前行，废科举、倡西学，国学被彻底地废弃，以至于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主张把国学请出大学校园，除了留下中文系。当时西方国家被作为进步的标杆，西方的自主思想是我们需要学习或接轨的。而今，这个熟悉的历史坐标已经慢慢变得模糊，不仅在东亚，在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同时以前被视为牢不可破的结构、根深蒂固的制度安排或者价值标准，现在都已经开始松动，甚至走向解体，包括美国所建立的一元化的全球霸权等。相对应的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其中又以中国为最重要的领头羊。随着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国家相互的加强，未来的世界格局必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就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的“巨变”令人震惊而又影响深远，其变化和推陈出新的速度让我们喘不过气来。“9·11事件”使美国陷入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金砖五国变成非西方世界的最高峰会，代表非西方国家提出虽不完全一致但也不追随西方国家的那些主张；接下来在 2007-2009 年发生了最严重的全球金融海啸，其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摆脱，许多国家的经济仍处在医院的加护病房；G7，曾经是美主导下最重要的全球协调机制，很快就被 G20 取代，而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英国将进行公投决定是否离开欧盟，结果虽未可知，但它能变成一个全国议题，对欧盟而言已经是重大的打击；此外，欧盟内部所谓的“开放边界”政策，因为难民问题在各国国内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情绪，《申根协议》能否维系前途未卜；德国是欧洲一枝独秀

的国家，其他国家的经济体系都很脆弱，基本都是以借债为生，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一个希腊危机就几乎要拖垮整个欧元区，倘若再加上意大利或者法国，后果可以想见……这些都是在二十年前不可能被讨论到的话题。然而，今天却都鲜活地发生在眼前。西方世界内部的诸多问题，使得其体制基础的合法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二）西方社会两大主导支柱面临巨大危机

西方社会有两大主导性支柱，一是自由民主，二是自由市场，目前两者都面临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大萧条”是观察当前全球危机最临近的基础参照点。在我看来，“大萧条”的结束主要应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不完全是因为罗斯福新政或部分欧洲国家推动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危机是否能顺利度过？当然，这一点也不能盲目下结论，毕竟历史不能简单地反向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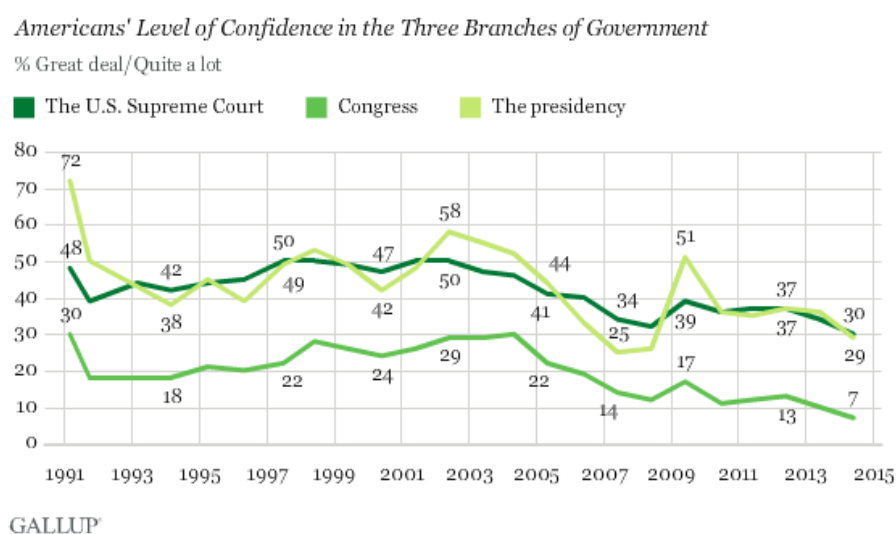


图 1：美国民众对民主机构信任程度变化示意图（1991-2015）

图 1 为美国民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度变化示意图。三条曲线分别代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最为重要的三个机构——总统、国会、联邦最高法院。对总统（职位而非个人）的支持率在过去 40 年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对国会的支持率也不高，自 80 年代以来就开始不断下滑，90 年代初已不超过 30%，最新的数据是 7%。这意味着什么？在美国，有几个行业最为人们所不耻，它们被视为靠欺骗而谋财，一个是律师，特别是打刑事官司的律师，只要付律师费，甚至完全可以颠倒黑白。另一个是卖二手车的，他们从不告诉你轿车真实的性能，只是想法设法把它卖给你。然而，即便是这两个行业，其受信任程度居然都比国会要高。最高法院本来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机构，但由于卷入了意识形态和党派冲突，做出的决定经常遭致巨大争议。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体制现在看起来已经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些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美国学者，均对本国现行政体感到愤怒，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反思“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民主”，即它不再是大多数国民的民有、民治、民享，而仅仅是占比 1% 的富裕美国人阶层的民有、民治、民享。沃尔玛的继承人合计资产有 900 亿美元，但全美最后面 30% 家庭的总资产还不到全国总量的 1%，基本上等于没有资产，甚至是负债、负资产。90 年代初期著有《历史的终结》一书的福山在最近的新书中指出，美国的体制已经被利益团体侵蚀、扭曲到积重难返、无法正常运转的程度，即表现为所谓的“否决型政体”。有些学者也作了精致的研究，探讨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律与美国多数

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立场）是否吻合，结果发现，美国国会通过的绝大多数法案都和一般民众的需求和期待存在相当的反差。每个利益集团内部基本上都配有强大的游说力量，这些游说者对该领域拥有全面的掌控力量，主要包括政府外围的智库、律师事务所、政治顾问等等。

正在进行的这次美国大选非常特殊，也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之处，因为在美国即使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都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而特朗普居然能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当美国基层民众所累积的挫折和不满到达临界点之时，它就会通过两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一种就是选民不愿选择体制内候选人，因为他们背后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瓜葛，而且完全忽视选民需求。此外，他们还可能将愤怒引向国外，例如责怪中国人、日本人窃取了美国公司的技术，怪罪墨西哥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工作等等。

在自由经济方面，西欧国家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战后体制有效缓解了“福利冲突”，但现在看来它已经运转失灵，事实上也不可持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再享有优越的国际地位与外部环境。五十年前，欧美垄断了世界工业市场，小到药品、汽车，大到工程机械甚至人造卫星都出自发达国家。然而，现在西欧在世界上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数量寥寥，且大部分集中在德国。相较之下，美国状况要好一些，像苹果手机，生产成本极低，但它却能够塑造、操纵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它的成功之处。总而言之，能享有世界范围经营机会的欧美企业，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则越来越少。一旦没有这

种能够创造巨大利润、支付高工资与高税收的暴利企业，既有的福利体制就将难以为继。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它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前，新自由主义普遍被政治学者、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视为金科玉律，即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由市场决定汇率、利率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主张打造一个将所有人人为的跨国障碍降到最低的、高度整合的全球市场。它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处方很简单，即解除管制、私有化、自由化以及供给端经济学，而且极力丑化政府、神化市场和私有企业。

世界范围内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一些国家恢复了市场竞争的激励和效率，但也问题丛生。以美国为例，其国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二战结束之后的三十年曾有明显改善，直到 80 年代初期。据此，有的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贫富差距改善可以并存。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这个趋势就已经开始回到历史轮回的轨道之上，甚至几乎快要回到全球“大萧条”前夕那个极端的历史节点之上，并且带来了诸多新的不良后果。

Company	CEO Compensation	Median:		CEO Compensation as Multiple of:	
		Non-Manager Compensation	Manager Compensation	Non-Manager Compensation	Manager Compensation
1 Oracle	\$79,606,159	\$63,080	\$139,330	1,262	571
2 McKesson	\$51,744,999	\$48,575	\$117,960	1,065	439
3 Walmart	\$20,693,545	\$24,745	\$67,915	836	305
4 ExxonMobil	\$40,266,501	\$62,715	\$146,170	642	275
5 GE	\$25,806,352	\$46,535	\$110,735	555	233
6 Philip Morris	\$30,304,091	\$55,610	\$121,345	545	250
7 Pfizer	\$25,634,136	\$54,190	\$129,320	473	198
8 AT&T	\$22,234,703	\$55,888	\$125,120	398	178
9 Bank of America	\$8,321,300	\$52,800	\$116,050	158	72
10 Google	\$7,628,624	\$56,455	\$142,980	135	53
Median	\$25,720,244	\$54,900	\$123,233	550	241

表 1：2013 年 CEO 薪资与公司员工薪资对比

表 1 是美国企业一般员工的薪资峰位数与企业 CEO 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在 35、40 年前一般低于 50 倍，而现在在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是 550 倍，而且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合理的结果，因为与其生产效率和生产价值相匹配。

近年来有一本畅销书——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不平等与资本》，我称之为“压倒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今全球经济仍处于非常艰难的局面，虽然不是全面危机，但对所有国家也都造成了严重的拖累，中国国内称之为“下行压力”，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全球贸易规模的萎缩。它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基本处于不断扩张趋势，因为自由贸易使得关税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跨国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些都使得贸易量不断上升。但是近些年它却遭遇到了明显的瓶颈（图 2）。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超过了 3%，然而贸易额居然没有同步增长，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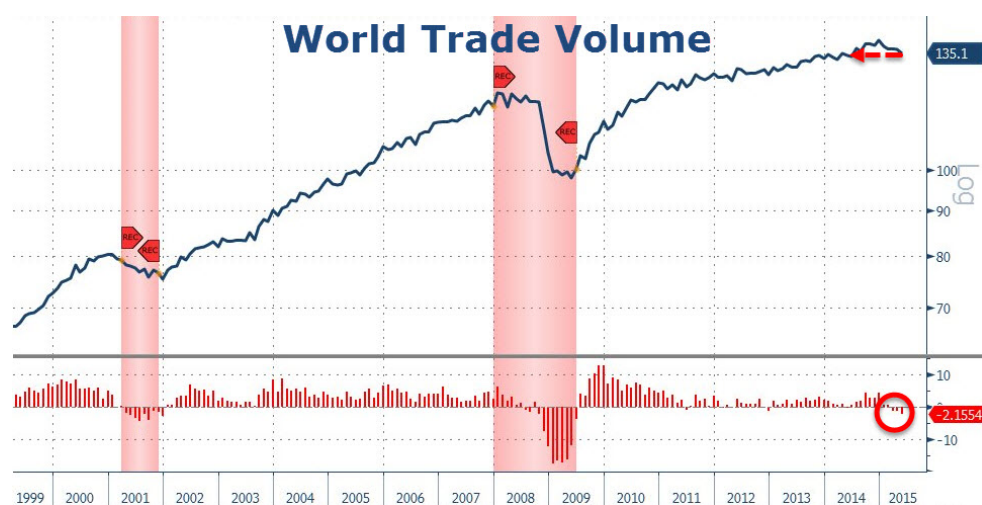


图 2：世界贸易增长变化曲线图（1999-2015）

在原有的历史坐标内，人们并未预想到这些现象的出现。从 2010 年开始，欧洲主要国家的两年期国债利率不断下滑，在 2012、2013 年基本接近于零。德国甚至从 2012 年开始就一直是负利率，这意味着如果去买德国的政府公债，不但拿不到利息，而且还要倒贴。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都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情况更严重，它陷在通货紧缩的漩涡里根本跳不出来，货币政策又完全失灵，所以也不得不采用负利率政策，并且可能还要再继续往下走。上述都是巨变时代的一些典型征兆，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这些现象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美国主流社会科学陷入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那么知识建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乃至预测这些问题吗？

（三）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在当前这样一个时代，全人类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巨变，变动要往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之中，都会觉得手边的理论工具或知识基础不足以去回答这些问题。要思考欧洲、日本、美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倘若没有对 1880 年以后世界经济史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就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也就找不准参照点。总而言之，在这个巨变时代，我们应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什么样的结构转型力量所推动以及蕴藏与积累了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与动能。

倘若在制度很完美、结构很稳定的时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枝节性、实践性的研究，寻找两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现代主流社

会科学正在做的工作。然而，当结构变了、关系也消失了的时候，就不能再走这样一条简单、表象的路了。面对知识生产结构的严重异化，我们需要反思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时代的大问题？我们熟悉的理论与方法是拓展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可是这些问题常常会被知识工作者所忽视，因为现有知识的生产体制已经与学术生存规则捆绑在一起：学者们忙着撰写、评审学术论文、申报社科基金、筹备主管部门视察，因为这些活动与他们的职称评定、职位晋升和工资待遇等密切相关。

我认为这就是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它难以预见和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它让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陷入巨大困境，同时也难以解释中国发展的经验。然而，学界内部对此的反省并不深刻，因为这批构建现有知识体系的人占据着重要的职位，掌握着最核心的期刊，所以这种趋势很难迅速改变，而当学术研究的主流路线被大规模扬弃的时候就是新的时代到来之时。此外，这种困境也源自知识社群的建构，以及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形成的互动或者资源交换关系。在美国，各大经济系和工商管理系有一群讲座教授，他们比教授薪水还要高，这是对学者很大的鼓励和激励。而这些钱由谁来出？就是那些大企业的老板，以此来支持那些对他们自己有利、能够论证自身财富合法性的学派和思想，他们绝不会支持左派的经济学者或帮助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以上这些就是我从知识社会学以及全球资源关系角度提出的几点思考。

二、主流社会科学困境之一：意识形态偏差

主流社会科学困境的根源，一是其采取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二是它所依赖的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基础——逻辑实证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之所以会不自觉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正是因为它将其主流信仰深度融入到了学术研究之中，其突出表现就是自由主义偏见。西方社会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状态或者很自然的架构起点，所以才会有“社会契约说”等等，进而将其视为普适性原则，声称好的制度就是尊重个人选择自由，由此将世界观、价值观与整个信仰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要素在欧洲还略微能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欧洲的学术机构整体而言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没有那么强的替代关系，这反而容易创造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但美国却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与联邦政府、企业捐助以及校园捐助密切相关。这种关系结构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存的秩序、经济结构和世界状态通常缺乏批判能力，同时会保持强烈的保守形象。当然，这其中也有少数的例外情况，但都处在十分边缘的位置。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这三种制度则是自由主义偏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实践形式。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另一个牢固的前提或信念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它认为西方始终处于世界先进地位，这是区别历史进步与落后唯一的坐标。西方率先迈入现代社会且会持续引领整个人类

社会，而非西方国家要么是已经完成向西方模式的靠拢，要么就是正处于过渡阶段。

这两组预设立场不仅严重阻碍我们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而且也会压缩人类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例如对中国的研究而言，由于意识形态主导了研究方向，导致他们永远在寻找中国体系危机的所谓线索。我最常被美国学者问到的问题就是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民主，或者一党体制什么时候会崩溃，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有可能长期、动态地持续下去。他们忽视了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与时俱进的能力会不断地提升与调整现有机制，例如国家治理能力、精英选拔与培养以及内部权力制衡。

类似的困境也出现在国际关系学界，那里存在着严重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倾向。他们所谓的问题意识，就是在维持美国的霸权结构，倘若是霸权结构下的被支配者或利益受损者，是绝不会提出诸如霸权稳定论、安全困境等问题的。而“自由制度论”和“民主和平论”的提出则是意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国际关系研究暗含着的理论假设是，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以这样的视角看待世界就会不由自主地忽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难以理解中国提出的“永远不称霸”和“和谐世界”等主张。

当前的世界格局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的混合体，目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而且还在持续恶化的过程中。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看到失序状态：美国的单边主义架空了联合国的

集体安全体制，它的选择性军事干预与政权改变策略加剧了很多地区的宗教、文明和族群冲突，北朝鲜问题一部分根源也在于此。

全球经济严重失衡。2008 年金融危机不过是个病征，而且这个病征由于其病因还未真正根治，所以一定还会再犯。西方国家大都是以债养债。法国所有可以收费的公共设施，其未来收益权全都已经出售了；意大利许多学校的校产也都卖掉了，再编制预算从私人那里高价租回来，所以以债养债不只是发行债券的问题。当然，也有少数比较健全的国家如德国。极少数的富豪阶层和跨国企业拥有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权力，也包括非西方新兴的精英阶层如马云等。相应的，大多数国家机构的利益协调与保护职能正在日益空洞化。此外还包括环境问题、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差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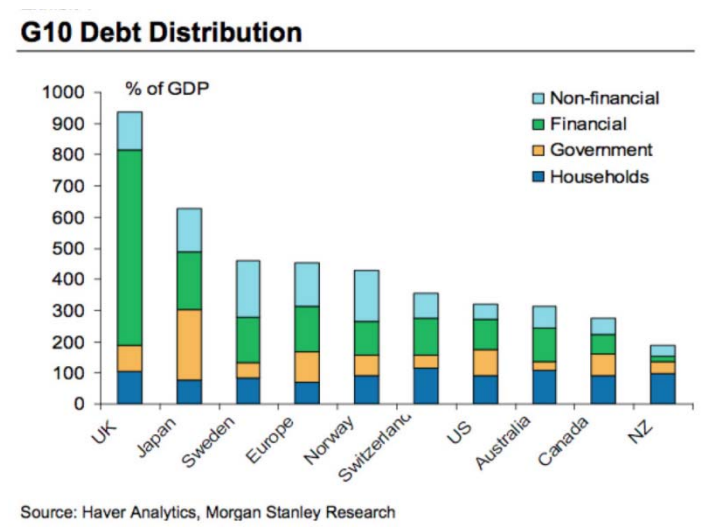


图 3：2014 年 OECD 国家债务负担示意图

图 3 是 2014 年 OECD 国家所负担的债务表，这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表征之一。2014 年的世界经济量级是 70 兆美元左右，同年的全世界总债务高达 211 兆美元，将近 GDP 的 3 倍，其中包括政府负

债、个人负债和企业负债。就各国的债务结构而言，所有发达国家的形势都极为严峻。^①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它对于“巨变时代”面临问题的回应性很薄弱，也很零星，而且内容需要极大的修正。而这对于学术研究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言则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三、主流社会科学困境之二：逻辑实证论的歧途

主流社会科学之所以对这些时代重大议题缺乏有效的回应，也与其知识源头即逻辑实证论有关。它是物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自然科学以物理学为标杆，而经济学希望成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物理学”，也认为能够在经济生活乃至广义的社会生活里面找到类似物理世界的定理、定律，最好是以数字的方式定义出来，当然还需要以实证方法来验证。但是，这存在极大的难度，因为人类除了小范围的实验以外，很难做社会实验，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间接和替代方法来弥补实验方法的局限性。

其他社会科学往往在面对经济学这样有科学性地位的学科时表现出先天的自卑，所以在过去三十年全面以“经济学”为师，又尤其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师。经济学则将自己简化成应用数学系和应用统计系，现在台湾很多经济学者都是数学系、机械系、物理系毕业的，由于数学优势使其具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现在大多数主流经济系的必选

^① 英国的资料需要修正，它是全球金融中心，金融部门所占比例特别大，等于全世界的资金都交由伦敦的金融机构去管理和操作，若去掉这一部门，它的负债就没有日本那么严重。

课程里面很少有经济思想、经济史或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因为他们对“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科学的知识”的认识已经被非常严格或者刻板的规范所引导。而这个规范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逻辑实证论之上的科学体系，即根据程序建构出来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知识。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错误导向：一是社会科学盲目追求经验法则而忽视经验规律为何产生、为何变化而又为何消失等这些深层的因果关系；二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导致社会科学一味回溯到个人层面去找寻解释的根源，从而忽视了历史事实的发生必须回溯到总体结构层面的基本常识。

由于自然科学从来不缺逻辑，而且更侧重操作实践，因而它们不需要学习科学哲学。但是自然科学又害怕被质疑不是科学，所以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哲学用于鉴定什么是科学，这就是逻辑实证论。需要注意的是，逻辑实证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遭遇到严重的危机，而且这套科学知识的理论完全背离了科学史证据，脱离了事实基础。若要根据科学史重新建构科学知识活动，前提是从科学史里归纳出来，而不是从形象学的哲学开始作引导和推论。库恩的著作虽然不是直接批判逻辑实证论，但也对其造成了严重而致命的打击。所以从“后库恩时代”（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他在书中回顾了许多科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所得出来的重要结论是逻辑思维论彻底误解自然科学。库恩的这一认知在科学哲学的知识范畴内形成了几乎已成定论的普遍共识，但社会科学界对此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四、新科学哲学：科学实存论

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领域，逻辑实证论没落后出现了新科学哲学理论，它以实存论为核心主张，因此又被称为“科学实存论”。它主张自然界中存在万古不变的真实世界，这个存在的真实才是科学知识的真正客体（探索对象）和检验人类知识可靠性的最终依据。科学知识只是人类在试图掌握与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阶段性、暂定性成果，它通过特定的符号或语言来记录与表达。科学实存论试图拨乱反正，重新建构一套理性的、符合科学史证据的科学哲学理论，它提供给我们在何种准则和前提下进行科学建构的新思路，以科学史的证据作为支撑点，因而能够更加正确地来说明或者是归纳知识。它对自然科学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带动一些新的研究，但它的覆盖不是全面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有科学史新的整合和重构。

科学实存论不仅可以让我们掌握自然科学的本质，也能帮助我们解决自然主义（naturalism）与反自然主义（anti-naturalism）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社会科学至今为止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社会研究到底能不能称为“科学”。

自然主义就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立场，它认为社会现象和社会世界可以完全参照或者模仿自然科学研究，因为对象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并且追求知识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反自然主义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世界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方法就不同，而且知识的追求目标也不同。这里包含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研究客观物质就是在研究一个分子结构，无

法去开导它、解放它，就是要了解它的特性，顺应这个特性、运用这个特性或者驾驭这个特性。但是社会知识工作者完全不同，他们的研究对象就与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群体里面的其他成员，甚至与研究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你可以与研究对象沟通，甚至可以改变它们。站在反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有种极端观点认为社会现象研究基本上和人文学科更接近，或者根本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所以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地称自己是科学。

科学实存论试图在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之间寻找一条兼容并蓄的“第三条道路”。持有科学实存论观点的学者认为“自然主义是可能的”，但也吸收了反自然主义论述中的部分主张，认为社会科学在借鉴自然科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时，必须针对社会世界本质的特殊性作必要的修正，不能毫无保留的移植。

首先它试图重新认识科学哲学。逻辑实证论所坚持的“经验主义”立场，是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知识活动本质的一种误读。科学家区分了三个层次的真实：实存层次（the real）、实现层次（the actual）和经验层次（the empirical）。科学实存论认为科学知识所探讨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真实世界——实存层面而非经验层面的世界，因为经验是以人的认知能力为前提，只有我们接触到、看到的世界才是经验层次。而实现层次就是指发生现象或发生变化。这些现象正是于实存论的结构所产生，但不一定所有产生的现象都能够展现出来或被感知到，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进入到经验世界。因此，社会科学探索的主要

对象应该是实存层次的物体、机制与结构的（永恒）性质与因果作用而非可直接观察的现象。

其次是在重新认识科学解释方面，科学实存论提出科学家对于可观察现象所提供的因果解释应该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 explanation）而非法则式的（nomological explanation）。结构性解释是将现象出现的原因回溯到实存层次来理解，将现象的出现归因于物体构造、结构与机制所具有的因果作用力而非归因于经验性法则（规律）。经验性法则并不一定常常有效，时空条件出现变化就可能失灵，而且它也不是科学知识追求的终点，而是科学探索的起点，因为这些规律为何可能出现也必须回溯到实存层面来解释。科学知识还需要回答“如何可能”（How is it possible?）的问题，预测与解释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正如科学家能够有效解释一个现象并不代表他们也能准确预测这种现象何时会再出现，例如地震。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别之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行动者即人的理念、认知以及人与人的交互构成的主观世界无疑是社会构成的核心部分——意义体系、思维世界。另一个差别是社会世界里的制度安排具有时空特定性，人的行为、社会活动很多都被它规范化、制度化。无论主观的意义体系还是客观的制度安排都是由社会结构所塑造，所以科学实存论超越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强调关注社会结构，因为它是真实的存在，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知识活动的恒常对象，社会科学也适用于回溯性解释即回到历史事件的发生机制。

第三是重新检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追求经验性法则，至少是机会性通则或条件性通则，科学实存论认为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工具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当然有其部分的实用价值，但却无法反映历史大趋势与结构变迁，因而也就无法深入了解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同时，经验性规律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下：内在的封闭性（intrinsic condition for closure）与外在的封闭性（extrinsic condition for closure）。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开放体系，封闭性只能靠人为去建构而且很难持久。科学实存论推崇的研究方法首先应该是以深入研究为主，以目前主流社会科学采用的广泛研究为辅，而不应本末倒置。此外，强调研究者的理论解释应该以“回溯总体层次”（回溯到社会结构）为主，而以经济学所推崇的“回溯个体层次”（所谓的理论个体基础）为辅，否则也是本末倒置。其中深入研究是以个案或少数个案为焦点，抽丝剥茧地破虚这个个案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涵。

为什么要回溯到社会结构？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以社会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结构严格地去制约行动者、形塑行动者的认同、信念与价值。但社会结构并非独立于社会成员，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关系。结构的作用必须透过参与结构性关系的行动者的意识与理解，否则结构无法发生作用。“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争论其实反映出结构所设定的机会与可能性要经由行动者来实现，而行动者运用结构的能力有差别，甚至于社会结构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因为结构可以透过集体行动来转化。

现有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和研究成果与科学实存论是相呼应的，在此列举若干。例如，就研究路径而言，在社会学领域，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行动论、历史社会学的国家中心论、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分析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与习性理论等均具有典型意义。此外，还有政治学领域中比较政治的历史制度主义；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社会建构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葛兰西学派以及政治社会学中蒂利（Charles Tilly）的大结构与大过程等等。符合科学实存论的中国研究范例则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和史正富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等等。

五、巨变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突围与超越

短期的经验层次研究主要是工具性的，但在某些行业有巨大的需求，例如行销行业，广告的设计、代言人的选择与目标群体的设定都需要调查研究，整个商学院所教授的知识都与之相关，而且这种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能力很强。但是这种工具性的知识发生作用的前提是结构、制度或程序等实存层面不发生变化。微软操作系统的复制成本几乎为零，但它却卖到了 200 美元，因为存在股份有限责任制、分红机制、知识产权，它遵循着现有的游戏规则。但如果未来出现剧烈变化

例如世界性罢工，那么所有被认为理所当然、牢不可破的东西：财产权、权力结构、游戏规则乃至思维方式都可能被重构。

此时，深居象牙塔之中的美国主流政治科学正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一是政治学者的孤芳自赏，他们置身于美国社会的公共论述场域，陷入知识生产的自我循环，其所提供的知识产品既无政策参考价值，也无启发作用；二是研究主题脱离时代脉搏，忽视了自由民主政体的退化和败坏，不仅无视非西方全面崛起的结构性改变，更无视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三是研究内容规避规范性议题，这使得其既欠缺终极关怀也不具有批判或反思功能。

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要求我们更多地去探索实存层次的事物、机制与结构的（永恒）性质及其因果作用而非可直接观察的现象。当前，西方社会科学正处于结构不稳定、内在矛盾重重、制度面临不可持续性的危机之中，身逢其时，未来三五十年，简单地维持现状已无可能，更多地是需要知识层次的变革和对大历史知识的探索。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科学尤其应该如此。

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突破与超越，最重要的是拥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师友们而言，一定不能忘记自己作为知识工作者的终极关怀，除了谋生以外，还要坚持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切记不要简单停留在发表 SSCI 期刊论文那样的低层次之上；要透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可靠性，真正的知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可以引导有效的行动，解决问题、引领思想甚至改变他人的命运；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和批判性思考的训练，从深刻了解

自己所处的社会如何组成与运行，从自己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不要盲目跟从，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有些人的疑问说北大、人大、清华何时可以培养像哈佛一样的人才。我认为这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哈佛把学生送到中国这些大学，让他们的学生来学习中国优秀大学的长处；此外，要有知识关怀的素养，标准要高，而且要把它宽广化，即在地理范围和时间上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间的交流和对话，不应仅限于西方，而是要将它推广到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中东等不同区域。

演讲评论：

重返“中心”的中国及其社会科学

杨光斌^①

朱云汉教授给我们指出了“巨变时代”社会科学的困境与出路。关于时代变迁的判断，从量变到质变，这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范畴，这个量到质的变化是指火山爆发即革命式的突破。但是，有的时候量的变化本身就是质的变化，它看不到、摸不着，主要取决于人的观察能力。半个世纪乃至3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社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比如杜威既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又是很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从来不敢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尽管美国工人运动领袖都经常去找他，问他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提纲怎么起草等问题。今天，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支持率竟然如此之高，如果有庞大的选举机器的话，他无疑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一个例子是特朗普，它反映出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些革命性变化，这些在今天已经是发生了的事实。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量的变化就是质的变化，因为我们的体量太大了。考虑到大陆的体量，革命性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

^① 作者信息：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但是一般人觉察不到。因为我们的文化、心理、知识结构具有滞后性，我们依然拿着我们熟悉的那些东西来看待已经变化的中国。

社会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经验的一般化理论，如果这个定位是成立的，那么社会科学的变、知识革命、知识转型就是社会科学的常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只是假设它是科学的，因为很难说观念是科学的。我们看社会科学的常态，以欧洲为例，最早的共和主义是真是假，我们不管它了，从古希腊到罗马，到中世纪前期的神权主义，到中世纪后 500 年的绝对主义和王权主义，再到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激进化以后导致的保守主义和灾难化以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所有的这些“主义”都是因为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而产生的思想的革命性变化。所以说“变”是社会科学的常态，知识结构的转型，知识结构的革命性变化是社会科学的常态。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做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做比较政治不是说哪个国家更好，而是比谁更不容易，每个国家的治理都挺难的，也都危机重重，很多时候看的就是谁能扛住危机，并且能扛得过去。

在当下身处危机的世界政治当中，中国在转型，社会矛盾很多，比如说“去产能”导致的工人分流有 800 万人，这是什么概念？什么是政治？这就是政治！美国也在危机中，欧洲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国家已经空心化，现在难民潮又来了。刚才朱云汉教授讲了很多欧洲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逆发展”，指的是 20 世纪初南美的几个国家，当时它们的人均 GDP 甚至比欧洲的比利时还高，

但半个世纪以后出现了逆发展或者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逆发展还没有停止，也绝不会是个案，下一个逆发展的案例很可能出现在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希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这个国家就称不上大国、强国。所以说欧洲也在危机当中，更别说广大发展中国家了，中东100年来建构起来的秩序崩塌了。但是在这些世界危机当中，“思想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什么？我称之为“百慕大金三角”，这就是指政治上自由民主化、经济上市场化、治理上社会化。我们说的国家治理当然是治国理政，这是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而西方人讲治理的时候就是指个人权利。试想，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本身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走“三化”道路即意味着掉进“百慕大金三角”，这听起来可能很美妙，因为个人权利得到了充分扩张，但是“三化”中的每一个方案都是去国家化。正在热播的《疯狂动物城》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政府很坏，警察代表司法正义，警察结合流里流气的社会分子，即社会力量和司法力量一起把代表邪恶力量的政府解决掉了，这就是洗脑文化。比较研究的结论是，政治、经济、社会上的“百慕大金三角”，一旦掉入进去，就会被巨大的涡流裹挟而永远不会再有回头是岸的时候。

“百慕大金三角”不能解决问题，于是福山又制造新概念了，即所谓的“三个制度支柱”：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但是问题是很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方案给你了，就是包治百病的。比如说对南美、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这些国家，当然更别说非洲了，这个药方你给出了，它也没用。比如法治，在我看来，中国

人不但追求法治，我们还把法治当作一种信仰，因为我们深受法治缺失之苦，比如有周永康这一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法治很重要。但是福山只认为欧美那一套东西才是法治，我有的时候想，中国一个朝代稳定 300 年、200 年，100 多年算短的，这些东西靠什么来维持？不就是我们讲的文化、规矩？规矩本身不就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治法”即今天所说的“法治”吗？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是什么？不就是习惯吗？习惯成了规矩，在英国就叫“法治”，在中国就叫“人治”？当然这里有个程序上的差异。

再说民主问责，福山讲只有选举的政权才能够对选民负责。我对世界政治的观察不是这样的，朱云汉教授有很多数据告诉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选政府的无效治理而言，它们对谁负责？无效民主、无效治理，不能治理的政府对谁负责呢？因此我觉得福山可能是以稳定代替了责任，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四年一届，八年政党轮替，比如台湾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可能带来稳定，但是它能真正带来责任吗？这是概念上需要我们追问的。

所以说，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在转型当中，但是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知识体系还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关于冷战政治学，有很多书已经翻译过来了，都是美国人写的，他们也在揭示这些东西，冷战以后的社会科学说到底就是“冷战学”。冷战学就是我们关于自由民主的研究，它可以被看做一种“革命理论”，甚至可以用来打倒对手。其实，和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民主理论的革命性一样，美国提供了另外一套革命理论，即自由民主，这套革

命理论可以打败敌人，但却不能用来治理国家。试问，哪个国家靠自由民主能治理得好？自由背后是法治，有民主没有集中，没有权威，这个国家怎么办呢？所以我说自由民主是一个革命理论，它对吸引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来说很有效，尤其对我们读书人。

今天看到分流 800 万工人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政治？800 万的分流不就是最大的政治吗？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意味着什么？“阿拉伯之春”怎么来的？800 万人的就业就是最大的政治。自由民主是革命的理论，不是国家建设理论，更不是治理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本质就是“百慕大金三角”。福山也在反思，他认为，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在非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就不行，再强调社会，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越来越乱吗？

应该说，这个时代对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大陆的学子来说，是一个契机。我十年前这样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转型国家，我们很痛苦，因为转型是结构上的转型，它让人无所适从，会冲击你的安全感。处在转型之中的人是很痛苦的，但对处在转型中的学者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福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得到，你所处的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记得 1977 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就职演讲的时候，他讲衡量一个社会科学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否对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刻约束着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认知有启示性贡献。在大陆，虽然很少但也有这样的作品，比如《黄河边的中国》。

在这样的大转型当中，应该说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很幸运的。我梳理了一下“中国社会科学”，我们要问“中国”在哪里，刚才朱云汉教授主要从方法论、哲学观角度尤其是实证逻辑的角度解构西方社会科学面临危机的根源。现在我们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中国”在社会科学体系当中，无论是国际关系、世界政治还是我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中国”在哪里？中国无影无踪，没有中国，中国社会科学中居然没有中国。

这里有很多原因，我们看看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从晚清到中华民国，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就是大概 100 年左右的历史。我把它大概分为三个 30 年，第一个 30 年是晚清到民国这 30 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喊大陆有很多大师，可能有很多国学大师，社会科学大师是谁？费孝通算一个，因为其“差序格局”概念，政治学呢？废除科举以后，最发达的社会科学是什么？不是今天的经济学，而是政治学，我们看看民国政治学，大师在何方？那时候的西学是多元化的，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它是非常多元化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

第二个 30 年是计划经济时期的 30 年。这个时期的美国也一样，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我们这儿更是清一色的意识形态化。从 1949 年到 1979 年没有社会科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科学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反思“文革”本身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作用。

第三个 30 年是从 1980 年到 2010 年这第三个 30 年，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哈佛毕业生”，不管去没去过美国，不管去没去过哈佛，都是读美国人尤其是哈佛教授的书长大的，这是西学 2.0 版，比西学 1.0 版更纯粹，西学 1.0 版是多元主义的，而我们今天的西学 2.0 版是单一“主义”也即自由主义的突飞猛进。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史，加上社会科学管理的自然科学化，对我们社会科学而言更加雪上加霜，大家知道我们的 SSCI，朱老师一开始也给大家提出要求了，只追求在 SSCI 期刊发文，那个层次太低了，当然可以帮你当教授，但是当了教授不一定境界就更高了。大陆把 SSCI 当作一个标准，美国人说这是“超级愚蠢的中国人的想法”（Super Stupid Chinese Ideas），也简称“SSCI”。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30 年，比如说从 2010 年到 2040 年，就是赶上党的第二个 100 年，能够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科学，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推动这个趋势的自觉，我称之为“新转型世代”，相比第一个“转型世代”，正如张灏先生所言，从中国 1895 年被日本打败，到 1925 年，大致 30 年，国学被妖魔化，西学全面登陆。而 100 年以后，是不是会有第二个思想转型时代？大概也需要 30 年，而且要看我们的努力程度和造化。当然，还有一个怎么做的问题。我们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史会发现，美国二战之后有一个“三体运动”——国家进场、基金会配合、学术共同体主导。现在我们大陆太有钱了，国家进场，但是做事需要更加专业化。我们有很多研究中心，我称之为任务型组织，而不是使命型组织，而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是有使命感地

做某种事的。实际上，我们最缺的是学术共同体的主导，不然国家花再多的钱恐怕也只能事倍功半。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提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然新概念的形成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事，需要久久为功。

20 世纪 50 年代，阿尔蒙德等一大批美国学者组建了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他们说美国人来了，基于欧洲经验的老政治学该让让位置了。最终，他们真的做到了，比如建构起来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从过去的政党、政府、法条研究，下沉到研究社会、个人选择等等。他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尽管其本质上仍属意识形态范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信地说，中国人来了，基于美国经验的政治学该让让位置了？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从思想史和学科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学的知识转型、知识革命一直在发生，“变”是社会科学的常态。当前，以玩量化模型的理性选择主义、博弈论已经把美国政治学带入死胡同，美国政治学的“落点”不应该是中国政治学的“起点”吗？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建设阶段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国民特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中国政治学绝不能继续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中国已经回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但心理状态的滞后性决定了很多人还在像过去 30 年一样盲目学习西方，继续套用美国政治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政治。在这一点上，朱云汉教授的判断非常具有方向性，即“向西方学习”这个历史坐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整理人：林雪霏、赵卫涛、李方乔

电 话：010-62515049

邮 箱：nads_ruc@126.com, nads@ruc.edu.cn

网 址：<http://nads.ruc.edu.cn>



思想决定命运。

研究关乎国家方向的思想问题和话语权，

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责编：林雪霏 赵卫涛